



李秀珍 等著

逆水行舟

中国和平发展的环境、议题及对策

*Sail
Against the
Current*

Striving for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逆水行舟

中国和平发展的环境、议题及对策

李秀珍 等著



*Sail
Against the
Current*

Striving for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逆水行舟：中国和平发展的环境、议题及对策/李秀珍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9

ISBN 978 - 7 - 5203 - 0493 - 1

I. ①逆… II. ①李… III. ①发展战略—研究—中国
IV. ①D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621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侯苗苗
特约编辑 明 秀
责任校对 王纪慧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242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自16世纪初全球化发轫，一波又一波大潮涌动，主动踏浪者耸立潮头，赚得盆满钵满，志得意满；被动无奈者，遭殖民瓜分之厄运，满是伤痕。本在中古世纪处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进入16世纪大航海时代后，一次次被甩开，即便在1840年被外人以武力强开国门后，命运依然坎坷颠簸。幸20世纪80年代后，国人一改往日之貌，积极且热烈地拥抱全球化，国运随之大为改观，甚令世界侧目。然，崛起之路并非坦途，不同时期临不同环境，面不同问题，自然需采不同之对策。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中青年学者李秀珍、赵斌、金新、朱旭、万翔，怀爱国、忧国、报国之心，从学者之视角，以学术之形式，分别从中国和平发展的环境、面临的议题、采取的对策阐述了他们的真知灼见。

在“环境篇”，结合近年来喜忧交织的热点问题“一带一路”战略和东北亚、东亚安全，万翔和金新提出了他们的观点。万翔的《丝绸之路与西方古代观念中的中国》一文回顾了近代西方学者提出“丝绸之路”概念的历史，以及古代希腊罗马作家透过丝绸之路对遥远的“丝绸之国”中国的认识；指出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和西方世界交流的重要途径，更是古代中国文明得以保持其先进性和独立性的必要条件；通过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发展的分析，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终将使中国重现富强与繁荣，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重要战略。从地缘政治学的视角看，东北亚及东亚地区对中国的安全至关重要，如何评估中国在东北亚的安全威胁

和东亚的海洋安全环境，金新的《中国东北亚安全威胁评估》和《21 世纪初中国东亚海洋安全环境》的观点是，虽然近年来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出现一系列新动态，但地区安全结构的基本特性并未发生质变。美国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之下继续实施战略重心东移，是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面临的根本挑战。间或升温的中日钓鱼岛争端，对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构成了直接挑战。依旧严峻的朝鲜半岛局势，则是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的间接挑战。而 21 世纪初的东亚海洋安全环境延续着“冷战”结束以来的霸权秩序模式，当前东亚海域的单极霸权具有非完全性，中、俄、朝大陆势力与美、日、韩的海洋势力的隐形对抗和美、中、俄间的大国战略互动，制衡着美国的海上霸权。在霸权秩序模式之下，东亚海洋安全秩序的有序程度并不高，秩序状态大致处于低度有序层次。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东亚海洋安全领域摩擦、冲突与对抗频发，海洋安全形势出现显著的趋紧迹象。

谈及中国发展的周边环境，东南亚地区不能不提，金新的《东盟区域安全治理：模式、历程与前景》以安全治理的理论范式关注了东盟的区域安全治理问题。东盟区域安全治理模式是一个多层次、多主体的结构，包含内外两个部分的机制框架，具有安全保障和冲突管理两大功能。东盟区域安全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国家利益的冲突、战略互信的缺失和区域制度的不足成为其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建构“东盟安全共同体”是东盟区域安全治理的未来走向。对东盟区域安全治理的运行，中国须制定合理的因应之策。

近年来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的热点问题就是气候政治，在这一新的话题领域，作为新兴大国之一的中国掌握了怎样的话语权？取得了哪些成就？又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在“议题篇”，一直对此问题怀有浓厚兴趣，且取得了一定成绩的青年学者赵斌在西安交通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是最有发言权的。他的《自反性与气候政治：一种批判理论的诠释》认为现代性的成就与破坏性共同反映在

气候政治当中,表现为自反性气候政治,并昭示着现代性本身的深刻危机;人的自反性在气候政治认知中建构了三种典型的社会观念情境:乐观主义、现实主义、悲观主义;自反性气候政治及其未来愿景,既批判现实又指涉未知未来,体现了批判理论的解放立场。《大国国际形象与气候政治参与:一项研究议程》提出,国际形象对于国际政治中的大国而言是一个不容忽视却又难以界定的重要因素,它包含了一定时期内为他者所认知的国际相对地位、身份、威望、声誉、荣誉等。在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对国际形象的界定较为模糊,甚至一度曲解,国际形象的建构其实是一个渐进和复杂的过程。大国参与气候政治的行为与其国际形象存在相关关系,正向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政治进程,可能使大国的国际形象得以重塑,对于新兴大国而言,亦有助于为自身崛起而进一步创造软条件。《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形成机制——集体身份理论视角》指出,近年来,新兴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政治影响力空前提升,并凸显出群体化特征。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及其形成机制,既是理论难点又具有现实意义。文章从新兴大国的概念辨析入手,以集体身份理论为视角,分析全球气候政治系统进程中的新兴大国身份。从“G77+中国”“BASIC”到“BRICS平台下的气候合作”,并逐渐以“BASIC”为主导,形成了新兴大国自群体;以减缓、适应、资金和技术为具体的议题导向,框定了新兴大国群体尤其是BASIC拟形成中的准集体身份边界。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之形成,其许可要素在于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等国的气候政治参与。赵斌在《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以中国和印度为比较案例》中进一步表明了他自己的观点,全球气候治理需要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参与;中国和印度作为新兴大国,通过双层互动而逐渐产生气候政治变化以回应系统内外环境压力;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变化的反馈效应亦再造/强化了其集体身份,使新一轮国际—国内政治的双层互动获得势能,从而维持整个政治系统生活的动态运行。

面对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林林总总的问题，中国的对策是什么？在“对策篇”，李秀珍首先面对一个性质上是中国内政但又有太多国际因素掺杂其中的台湾问题，此议题对于中国而言意义重大。《“台湾主体意识”构建过程及对策研究》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主体意识”逐渐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其核心内容有二：一是“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二是台湾前途要由2300万台湾人民决定。“台湾主体意识”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让它恶性发展，形成台湾与中国大陆敌对的局面，那对于两岸人民来说，将是严重的灾难；二是尊重差异、包容差异，正确地面对差异、处理差异，通过交流交往，增进共识、增进互信，在共同建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朝着“认同台湾”与“认同中国”互相连接的方向发展，这应当是两岸人民共同的愿景。为回应“环境篇”的东北亚及东亚安全问题，金新在《东北亚区域安全机制建构与中国策略》中提出，推进东北亚区域安全机制建设，已成为地区各国的现实需要和政策共识。东北亚区域安全机制，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保障各国共同安全和规范各国对外行为为主要目标。包容平等、合作共赢、综合治理和协商一致，应成为东北亚区域安全机制的基本原则。集体安全模式、军事联盟模式和多边合作模式，是东北亚区域安全机制的几种备选模式。但唯有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东北亚区域安全机制最为合理的模式选择。东北亚区域安全机制构想的具体落实，需要遵循以经促政、循序渐进的路线。依托六方会谈框架，提高制度化水平，亦是其可行路径。在东北亚区域安全机制建构中，中国应当成为坚定的支持者和积极的参与者。金新在《中国东亚海洋安全战略刍议》中提出，近年来中国东亚海洋战略环境出现恶化迹象，中国有必要制定合理可行的东亚海洋安全战略，以实现本国海洋安全利益的有效护持。中国的东亚海洋安全战略应首先厘清战略目标间的轻重缓急，规划战略目标的先后次序，明确海洋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 and 环境安全五个维度的近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这一战略应坚持“有限

海权”的战略原则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实施该战略的具体政策路径包括：加强海军现代化建设，适度推进海权力量发展；在海洋争端中采取差异化政策；加强对海洋领土的有效管控和主权宣示；提高中国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加强对南海油气资源的实质性开发；处理好同域外强国特别是美国的关系；从敏感度较低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着手，推进国际海洋安全合作；积极推动海洋安全制度构建。

东南亚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地区之一，处理好中国—东盟的安全治理是战略推进的重要前提。金新的《中国—东盟安全治理：模式、困境与出路》指出，中国与东盟在安全互动进程中初步形成了自身的安全治理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征：一是治理主体层面国家中心性强，二是治理机制层面制度化程度弱。当前由于中国—东盟关系中的阻碍因素，以及治理体系自身的缺陷，安全治理模式的有效运行面临着双重困境：治理主体间利益的冲突和互信的缺失，导致了安全治理的行动困境；治理体系的低制度化，导致了安全治理的效能困境。南海安全治理便是这种双重治理困境的一个典型案例。在今后的中国—东盟安全治理实践中，化解治理行动困境的出路在于通过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实现治理主体间关系的良性发展；化解治理效能困境的出路在于通过地区安全架构的建设，提升制度化程度，实现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变革。

全球治理是这些年学界探讨的一个理论热点，赵斌取全球治理中的一个点“气候治理”——《群体化：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选择》，认为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问题中的热点与难点，且由于其长期性、不确定性和公共问题属性，因而成为典型的政治议题。全球气候问题呼唤全球气候治理，以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形成了“抱团打拼”态势，群体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这种路径选择，源自结构和进程层次。全球气候制度结构是一种松散耦合的机制复合体，对参与主体缺乏有效的规约，变革成本较高，存在多层治理和复杂决策的困境；新兴大国的主体进

程，则表现为协调作用突出、基础四国松散联合主导、多群体间相互重叠，因而群体化参与全球气候政治实践平台。而朱旭取多边主义的视野——《新多边主义视野下的全球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指出全球治理的紧迫现实呼吁新的多边主义，新多边主义是在多边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全球公民社会进行国际合作的产物。新多边主义对全球治理的重构正在通过世界无数社会团体的努力，缓慢和艰难地向前发展。全球治理改革仍然处于探索中。作为后来者，中国对待全球治理改革的态度、政策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全球治理的未来。已经走上全球治理改革者道路的中国已没有退路，唯有继续扮演改革者的角色，方能获得全球治理改革的实质进展，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正义、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

五位学者作为当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队伍中的成员，身处中国快速发展之美好时代，也适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之黄金时期，能立足中国，环视全球，同时又能以世界之视野，反观中国，就中国和平发展之环境、议题及对策，贡献一己之见，甚为荣幸！

李秀珍

2017年3月

目 录

上篇 环境篇

丝绸之路与西方古代观念中的中国	万 翔 (3)
中国东北亚安全威胁评估	金 新 (20)
21 世纪初中国东亚海洋安全环境	金 新 (34)
东盟区域安全治理：模式、历程与前景	金 新 (50)

中篇 议题篇

自反性与气候政治：一种批判理论的诠释	赵 斌 (69)
大国国际形象与气候政治参与：一项研究议程	赵 斌 (84)
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形成机制	
——集体身份理论视角	赵 斌 (106)
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	
——以中国和印度为比较案例	赵 斌 (150)

下篇 对策篇

“台湾主体意识”构建过程及对策研究	李秀珍 (171)
东北亚区域安全机制建构与中国策略	金 新 (186)
中国东亚海洋安全战略刍议	金 新 (205)

中国—东盟安全治理：模式、困境与出路 金 新 (220)

群体化：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选择 ... 赵 斌 (237)

新多边主义视野下的全球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 朱 旭 (257)

后 记 (274)

上篇 环境篇

丝绸之路与西方古代观念中的中国

万 翔

摘要：本文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战略大背景下，回顾近代西方学者提出“丝绸之路”概念的历史，以及古代希腊罗马作家透过丝绸之路对遥远的“丝绸之国”——中国的认识；指出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和西方世界交流的重要途径，更是古代中国文明得以保持其先进性和独立性的必要条件；通过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发展的分析，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终将使中国重现富强与繁荣，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重要战略。

关键词：丝绸之路；赛里斯；“一带一路”倡议；文明发展与大国崛起

古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路与交通路线，也是知识、思想与观念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传播的途径。对于中国文明进程而言，丝绸之路以及由之所承载的中西文化交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丝绸之路 ——中华文明保持独立性和先进性的 必要条件

随着近年来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相关研究的发展，国际史学界逐渐形成了统一的认识，即兴起于墨西哥高原与中美洲雨林的古

代中美洲文明和发源于秘鲁、玻利维亚高地的古代安第斯文明，与传统的四大文明古国^①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六大古文明。在这六大古文明当中，古代印度河文明最先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来自中亚的印欧人建立的吠陀文明所取代，古代两河文明^②则在1000年以后被波斯帝国征服，又过了500年，已经希腊化的古埃及成为罗马帝国版图的一部分。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中国就成了欧亚非三大洲硕果仅存的古文明，与两大美洲古文明并存的局面一直持续到近代。

中国文明的延续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与众不同的凝聚力和家国天下的文化传统。相比之下，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诸多城邦之间，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抑或文化观念上都是充满着强烈竞争的。而在古埃及，书吏阶层对彼岸的关注甚至要超过生活本身——宏大的金字塔和神庙，精细制作的木乃伊，石棺上的铭文和《亡灵书》就是例证。建立在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观念滋养之上的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兼具这两大古文明的竞争性与彼岸性的特征。翻开西方历史的书卷，映入眼帘的是无休止的扩张、殖民与兼并战争，以及对浪漫远行、灵魂得救、征服自然的向往。而一直受到来自西北方的征服者影响的印度次大陆，则在其文化中体现了分层的特征。原始的语言与风俗习惯上的压迫，转化为种姓制度下不同种姓间的紧张。宗教势力在次大陆的根深蒂固，特别是婆罗门阶层对社会规范的控制，最终导致了佛教和耆那教这样的具有非暴力反抗精神的思想体系的诞生。在外来民族不断从西北方向涌入印度次大陆，给印度带来战争摧残和民族斗争苦难的同时，新的思想也不断注入，促进印度社会思想的深刻变革。然而在印度，最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没有改变，政治上的地方自治没有改变，宗教的多元化和宽容也没有改变。

① 四大文明古国，即中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和古印度。

② 两河文明即约公元前3000年发源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中下游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古文明，早期的代表是古巴比伦文明，晚期则是亚述文明。

与印度相比，除了保持西方与中国唯一通道的丝绸之路外，中国并未受到来自西方世界的任何实质性影响，更不必说对文明的改变和对民族的威胁了。整个古代，挑战中国文明的唯一“他者”来自北方——无论是苍凉的大漠、辽阔的草原还是东北地区的森林和山岭，与中原地区汉民族密切来往的北方民族，既为中华文明补充了新鲜血液，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因此，中华文明得以一直在欧亚大陆的东端独立发展，又以丝绸之路的东西交通，保持着在文化、技术上与西方和亚洲各邻邦的同步。

而古代美洲两大文明却因为与东半球的长期隔绝，以及两大文明之间的彼此隔绝，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之后，随着近代早期西班牙的殖民征服而急遽瓦解，最终完全被欧洲殖民者建立的文明所取代。玛雅人曾拥有非凡的科学成就，印加人有复杂的政治制度，阿兹特克帝国的繁荣超过整个西欧。但在钢刀、铁骑、十字架和病菌的侵袭之下，美洲的原住民以及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一起被西方征服者快速消灭了，数千年的文明独立发展，在十几年间戛然而止。

以地理决定论的思想来解释文明变迁的历史固然是片面的，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华文明以及以中华文明为主要思想文化渊源的东亚文化圈，正是由于丝绸之路的存在，才得以在东半球各大文明之中，在古代和近代始终保持其文明的独立性和先进性。中华文明之所以能保持独立性，既得益于其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又在于中国能够通过促进人员、商品和观念交流的丝绸之路，与西方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在与西方诸国相区别的文明自觉之基础上，保持中华文明的特性和统一性。中华文明之所以能保持先进性，则在于中华民族通过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独树一帜的精神传统，在与丝绸之路沿线诸国的密切交流中萃取来自异国的优秀思想观念和满足中华文明需要的物质文化，从而以东方巨龙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数千年。从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并非狭隘的地理概念，而是一直居于世界最发达、最富饶之列的古代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保

持领先地位的必要因素。

相反，正是在西方殖民者入侵远东，从海陆两端切断丝绸之路，并将西方的政治经济秩序强加于东方后的五百年间，中华文明经历了从先进走向没落，又在彷徨中重拾丝绸之路时代的精神，最终通过实业自强、思想解放、人民武装斗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迈上民富国强、和平崛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转折。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与世界各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这是我国首次将丝绸之路建设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如果说古丝绸之路是汉唐中国国际战略的自发产物，“一带一路”倡议就绝不仅限于单纯的国际关系决策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而是新中国应对多极化世界挑战的战略自觉，是整个中华文明21世纪和平崛起的重要推动力。

本文以“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背景，从文明发展的角度回顾丝绸之路研究的形成和其研究内容当中为中国学者所不熟悉，却是西方研究丝绸之路问题基础的部分——古代西方文献中的丝绸之路与中国。正如最早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德国地理学家、教育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①（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所说的：“正是丝绸之路带给我们（即西方人——笔者注）关于中国的知识。”自古以来，丝绸之路就是西方了解中国的唯一渠道。“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终将促进东西方之间理解和信任的加深，使世界各国与中国形成命运共同体，互利共赢，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① 李希霍芬早年从事欧洲区域地质调查，旅行过东亚、南亚、北美等地。多次到中国考察地质和地理。曾任波恩大学、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教授，柏林大学校长。提出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的科学。首次系统地论述了地表形成过程，对地貌进行形成过程分类，研究了土壤形成因素及其类型。他于1868—1872年在中国从事地理考察活动，为中国的地理学和地质学发展奠定了基础。